

史论

《世说新语》载录书家史料探析

王兴芬

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世说新语》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共三十六门,书中以简约的笔墨记述了东汉末年至刘宋初期文人名士的逸闻趣事,被称为是魏晋时期世人的百科全书。正因为如此,《世说新语》不仅是研究汉末魏晋时期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的重要史料,同时,书中收录的这一时期有关书法家、画家等的言论和逸事,也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书法家、画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宗白华就说:『要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一书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不可忽略的。』^①日本笔者将对《世说新语》中记载的这一时期的书家史料作一梳理和研究,进而探究汉末魏晋书家的审美倾向和个性特征。

风流潇洒、纵情任性的时代风气

《世说新语》中所录书家绝大多数生活在三国两晋时期,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世说新语》中有关书家的史料很多体现了他们潇洒自由的个性以及独特的审美倾向。众所周知,『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最自由、最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②这一时期特别是魏晋

时期的文人名士,他们从汉代独尊儒术的封建礼法的束缚下解脱出来,表现了对人自身价值的重视以及个性化的张扬,这一时期的书家更是如此,《世说新语》中就有很多故事记载了他们追求个性的率真与旷达以及高洁傲世的性格特点:

郝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郝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郝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郝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雅量》门第十九条)

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旁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伦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著门外,怡然不屑。(《简傲》门第十七条)

王羲之的坦腹东床是书法史上的佳话,王献之会稽游名园更是书家谈论不衰的话题。又,《晋书·王羲之传》说:

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鹤,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

羲之欣然写毕,笼鹤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

《晋书·王献之传》则说他:

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

王氏父子以他们超凡脱俗的言行、自由潇洒的风度显示出各自独特的个性。除此之外,锺会、王导、谢安、王济、桓玄、郗超等无不表现出纵情任性、潇洒自由的时代风气,如:

锺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言语》门第十二条)

桓玄尝登江陵城南楼云:『我今欲为王孝伯作诗。』因吟啸良久,随而下笔,一坐之间,诗以之成。

(《文学》门第一〇二条)

王子敬语谢公:『公故潇洒。』谢曰:『身不潇洒,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调畅。』(《赏誉》门第一四八条)

宗白华说:『晋人风神潇洒,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③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潇洒自由的个性以及超然世外的心境使得他们在书法中心手相应,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唐代的张怀瓘在《书议》中评价王献之的书法时就说:

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于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乘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故绝也。

可以看出,张怀瓘的这段话在评价王献之书法的同

时,也将魏晋时人风流潇洒的真性情在书法艺术中的表现突显了出来。由《世说新语》所录书家史料可以看出,生活在魏晋这样一个注重自身价值并张扬个性的时代,他们大多逍遥放达,标榜个性,注重独创。王羲之的叔父王廙就说:『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4]王羲之也强调了书家个体风格的独特性,他在《记白云先生书诀》中说『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宋代的欧阳修也说魏晋书家的书作:

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灿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5]

《孟子·万章下》说: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在王羲之和欧阳修看来,书法作品就是书家自由表达,充满个性色彩的艺术创作。

魏晋时期的书家之所以表现出自由洒脱、超然世外的性格特征,与这一时期大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不论是曹魏还是司马氏,他们的政权都是从前代巧取豪夺而来的,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排除异己,大肆杀戮文人名士,《晋书·阮籍传》就说魏晋时期,『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为全身远祸,这一时期的文士转而热衷清静无为的老庄学说,他们谈玄说理,寄情山水,远离政治。正是这样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了魏晋文人特有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正是魏晋书法走上顶峰的主要原因,魏晋之后的南北朝虽然也有众多书家出现,但都没有达到魏晋书法的高度。

毋庸置疑,魏晋时期人的个性价值的觉醒以及不与世俗同流的任情随性、自由潇洒、放浪山水的时代精神是魏晋书法兴盛的主要原因,而极盛于这一时期的行草书则是这一时代风气的体现。正如宗白华所说:

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

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恰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6]

对自然山水的情有独钟

由前文所述可以看到,魏晋时期的文人名士为了全身远祸,不得不远离政治,放浪山水,而长期的山林生活则更加深了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傲啸山林,畅游美景成为一时的风尚。《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或闭门读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返』。王徽之在《兰亭诗》中则说他『散怀山水,萧然忘羈』。《世说新语》中《栖逸》门第十六条也说:『徐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涉。』这一时期的艺术家们更是醉心于山林,从美丽的自然山水景色之中寻找心灵的感悟,如:

王羲之曰:『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引自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言语》门第八十八条)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言语》门第九十一条)

正是自然山水的绝妙美景激发了魏晋书家及画家的艺术灵感,使得他们的书作如行云流水,画作如身临其境。《世说新语》中所录书家很多都曾隐居山林或优游山水,《晋书·王羲之传》说: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从《世说新语》载录的书家史料还可以看出,他们不但喜欢自己寄情山水,还喜欢在品藻人物时用山水景物来比喻人的神韵与气质: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容止》门第三十条)

谢太傅问诸子任:『子弟亦何预人事人,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言语》门第九十二条)

王右军道谢万石『在林泽中为自遁上』,叹林公『器朗神俊』,道祖士少『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道刘真长『标云柯而不扶疏』。(《赏誉》门第八十八条)

受这一风气的影响,齐梁时期的书法评论家在评论书体及魏晋时人的书作时,也喜欢用山水景物来做比喻。如庾肩吾《书品》在上品之上评论隶书时就说:

峰崿间起,琼山渐其敛雾;漪澜递振,碧海愧其下风。魏晋名士的醉心山林除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之外,还与这一时期道教的盛行有关。通过对魏晋时期书家生平探究可以发现,除小部分书家如郗超、王珣等信奉佛教之外,这一时期书家很多都信奉道教。

道教认为,神仙大都住在十洲三岛、洞天福地。因此,远离人间,景色优美、安静闲适的山林就成了修道者心中的洞天福地。竹林七贤、王羲之、谢安等也都曾隐居山林,特别是王羲之,儒雅飘逸、高洁傲世的气质和个性,魏晋清谈之风的影响,以及退隐山林超然于世外的心境,都使得他的书风清俊飘逸,如行云流水。蔡邕《笔论》言:『书肇于自然……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正是因为魏晋书家纵情任性的个性以及对自然山水的情有独钟,才使得这一时期书家辈出,蔚为大观。

重政治活动而轻艺术创作的收录倾向

通过对《世说新语》中所录书家史料的梳理可以看出,刘义庆对汉末至刘宋初年各朝书家史料的收录,其中以魏晋时期为最多,汉代及刘宋较少。综观这些书家

史料还可以看到，除收录这一时期表现书家洒脱自由、风流潇洒的趣闻轶事及对人物言行的品评之外，《世说新语》对这一时期书家史料的收录，倾向是很明显，即重政治倾向而轻艺术创作。笔者对《世说新语》中所收每位书家的史料做了统计，收录了十条故事以上的书家主要有谢安（八八）、王导（六一）、庾亮（四五）、王羲之（三六）、桓玄（二九）、王献之（二六）、郗超（一七）、曹操（一六）、王济（一一）等，在这些书家之中，除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之外，其他几位书家都是在自己所处时代很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世说新语》中收录的这些书家的史料有很多与他们的政治活动有关，其中一部分故事表现了他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如：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慨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言语》门第三十一条）

《世说新语》中的书家史料，对书家政治活动的记述更多表现的是他们在政治上的野心和对权利地位的追逐，如：

初，桓南郡、扬广共说殷荆州，宜夺殷旆南蛮以自树。旆亦即晓其旨。尝因行散，率尔去下舍，便不复还，内外无预知者。意色萧然，远同斗生之无愠。时论以此多之。（《德行》门第四十一条）

相比较而言，《世说新语》虽然收录了二十八位书家的史料，但与书法相关的史料仅有五条，现抄录如下：

谢公问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固当不同。』公曰：『外人论殊不尔。』王曰：『外人那得知。』（《品藻》门第七十五条）

太叔殿始成，王子敬时为谢公长史，谢送版使王题之，王有不平色，语信云：『可掷着门外。』谢后见王，曰：『题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韦诞诸人亦自为

也。』王曰：『魏祚所以不长。』谢以为名言。（《方正》门第六十二条）

韦仲将能书。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因敕儿孙：『勿复学书。』（《巧艺》门第三条）

鍾会是苻济北从舅，二人情好不协。苻有宝剑，可直百万，常在母鍾夫人许。会善书，学苻手迹，作书与母取剑，仍窃去不还。苻勖知是鍾而无由得也，思所以报之。后鍾兄弟以千万起一宅，始成，甚精丽，未得移住。苻极善画，乃潜往画鍾门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状貌如平生。二鍾入门，便大感恻，宅遂空废。（《巧艺》门第四条）

羊长和博学工书，能骑射，善围棋。诸羊后多知书，而射奕余艺莫逮。（《巧艺》门第五条）

《世说新语》『品藻』门第七十五条虞龢《论书表》亦有记述，但略有不同：『谢安尝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答曰：『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王献之对自己与父亲书法『固当不同』或『故当胜』的说法后世多有评论，唐代的孙过庭、清代的包世臣等都认为王献之的回答有违封建伦理，但实际上，这是六朝较为宽松的社论思潮之下的产物，《世说新语》中与王献之有关的这两条故事均反映了他自由潇洒、高洁傲世的个性特征：他不会因为是和父亲的书法比高低就自降等级，并以『外人那得知』来回应『外人殊论不尔』的质疑。更不会因为是谢安送来的让题写的皇家牌匾就唯诺应允，唯命是从，并以『魏祚所以不长』来怒怼谢安『昔魏朝韦诞诸人，亦自为也』的说辞，让谢安折服。韦诞题凌云台的典故最早见于南朝宋时期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此后刘义庆《世说新语》、王僧虔《论书》、唐房玄龄等编《晋书》以及张怀瓘《书断》等均有记载，由此可见此故事流传的久远。关于凌云台，《世说新语·巧

艺》说其『高峻』『势危』，且『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据后世学者考证，韦诞题凌云台之事或许有之，但『头鬓皓然』与敕儿孙『勿复学书』之事应该是后人的杜撰，这个故事在后世的广为流传，实际上反映了魏晋书家对个体生命的注重以及对真率与旷达的个性精神的追求。《巧艺》门第四条讲鍾会善书，模仿苻勖笔迹骗走宝剑的事。第五条则是对羊忱及其家族善书的记述。可以看到，上述与书法相关的五条故事，除第一条涉及书家著作优劣的评论，最后一条陈述了羊氏一门善书的史实之外，其余三条都是对书家逸事的记述，均反映了书家或率真、放达、聪慧、注重个体生命等魏晋时期的时代风气。

综上所述，《世说新语》中所载的书家史料反映了汉末魏晋时期书法家的群体特征，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风尚：他们潇洒率真，纵情任性；他们热爱自然，醉心山林；他们的书法作品就是优游山水、感悟人生、凸显个性的最完美的体现。当然《世说新语》中的书家史料也反映了编者刘义庆重人物品藻以及重政治建树的思想倾向。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只是以庾肩吾《书品》为标准对《世说新语》中有关的书家史料进行了整理和探究，实际上，魏晋时期的书法家远不止本文所述，《书品》之外的书家在《世说新语》中的史料也有很多，还有待日后作进一步研究。

注释：

[1] [2] [3] [6]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二〇九页，第二〇八页，第二一二页，第二一三页。

[4]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欧阳修：《集古录》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

本文责编：张莉